

莫友芝《韻學源流》及其音韻學史觀

王松木*

摘要

莫友芝《韻學源流》是漢語音韻學史的奠基之作，對於漢語音韻學史的編纂有開創之功。然而，前人對於此書的解讀，大抵上是站在「語音史」的立場，以客觀主義（objectivism）觀點作為評定優劣良窳的標準，故多聚焦於理性、邏輯的層面上，側重「音韻學史」與「語音史」之間的關連，卻忽略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及其對《韻學源流》的敘述方式所產生的影響。

有鑑於此，本文參考「語言學史學」（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的研究方式，除關注《韻學源流》如何理性闡釋音韻學的發展源流外，更試著透過莫友芝的敘述方式，發掘文本所隱藏的詩學特質與意識形態，主要內容有二：一、以《韻學源流》文本為研究對象，採取「語言學史學」的研究路徑，探究《韻學源流》的敘述模式，解析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二、檢視當代學者對《韻學源流》有何不同評價，試著彼此調整觀看問題的視角，提出更具全面性、含括性的評價模式，讓不同立場的音韻學史研究者得以彼此對話。希望藉由本文之論述，得以補苴前人研究之缺漏，對《韻學源流》的意義與價值有更深層的認識。

關鍵詞：莫友芝、韻學源流、音韻學史、語言學史學、音韻思想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On Mo Youzhi's *Origin of Phonology* and His Historical Thought of Phonology

Wang Song-M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Mo Youzhi's *Origin of Phonology* is the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inaugurating the editing and compil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However, most of the former scholars took the stance of history of phonology and judged with objectivism. Thus, they usual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of phonology and history of phonetics, yet fail to address Mo's historical thought of phonology and his impact evoked from his narrative of *Origin of Phonology*.

Due to the aforementioned limits,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not only addresses how *Origin of Phonology* reasonably interprets the development of phonology, but also delves the text underlying the poetic features and the ideology. There are two main focuses: 1)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mode to analyze Mo's historical thought of phonology; 2) to examine if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any different treatments toward *Origin of Phon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just the perspectives of seeing, and then proposes a more coherent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ve model. This builds a dialogue among the phonology scholars who bear different stances. By doing so, the paper wishes to supplement the flaws of previous scholarly research and then deepen the meanings and values of Mo's groundbreaking work.

Keywords: Mo Youzhi, *Origin of Phonology*, history of phonology,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phonological thought

莫友芝《韻學源流》及其音韻學史觀

王松木

一、緒論

歷史並非只是一連串客觀事實的有序堆積，在編纂歷史文本的過程中，史家經常在有意無意之間，透過隱喻的方式，將個人的認知圖式融貫在歷史敘述裡，舉凡：如何篩選、剪裁史料，如何安排事件的發生順序，如何詮釋歷史事件的時代意義，如何論證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與演變過程……等，均不免受到史家個人之社會環境、學術思想、編撰目的等外在因素影響。正因如此，歷史文本與強調客觀性、邏輯性的科學報告有所不同，其文體性質反而較近似文學作品，因摻入編纂者的主觀意念而呈現出不同的敘述特色，體現出史家個人獨特的編纂風格。

歷史文本是「客觀事實」、「史家觀點」、「讀者反應」三者之間相互調適的結果。研究歷史文本，應當從多元的角度切入，除了依據文本記載還原曾經存在過的客觀事實之外，也應從「元史學」(metahistory)的觀點¹，探索史家的論證方式與意識形態，深入剖析史家獨特的編纂風格及其形成要素。然而，在實證主義的思潮之下，20世紀初期的史學研究大多側重科學性、客觀性的層面，忽略歷史文本所潛藏的人文特質；1970年代之後，隨著後現代主義浪潮的興起，歷史學者逐漸將眼光轉移到歷史文本的詩學特質上，〔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序言》指出史學研究的新轉向：

人們常說，歷史學是科學和藝術的一種混合物。但是近來，當分析哲學家成

¹ 語言學編史學的倡導者科納(Koerner, 1995)指出：「如果一個史學家不是考察歷史(the history)，而是置身歷史之外，分析、評判其他史學家的作品(histories)，那麼他所思考的就是超歷史(按：元史學)的問題。」轉引自姚小平(1996：8)。

功地澄清了在何種程度上歷史可能被視為一種科學時，對歷史學藝術成分的關注卻不多見。通過揭示出一種特定的歷史觀念賴以構成的語言學基礎，我試圖確定歷史作品不可迴避的詩學本質，並且具體說明其理論概念被悄然認可的歷史記述中的那種預構因素。(頁3)

後現代史學所倡議的語言學轉向²，對於漢語音韻學史的研究，同樣具有高度的啟發性。後現代史學指引一條新的研究路徑，讓我們得以擺脫客觀主義的侷限，改從人文主義的角度重新解讀漢語音韻學史著作，更深入地探索編史者的編纂風格與音韻學史觀。

莫友芝《韻學源流》是漢語音韻學史的奠基之作，羅常培〈校印莫友芝《韻學源流》跋〉(1929)評論此書的貢獻，云：

清人推跡韻學沿革之作，前乎莫氏者，有萬斯同《聲韻源流考》及潘咸《音韻源流》二書。萬書匡廓粗具，罅漏宏多；潘書憑臆杜撰，難資典要。莫氏此書，理明事簡，弗尚煩紆，博瞻或弗逮萬，而糾纏贅亂之譏，庶幾可免。(頁29)

20世紀以來，漢語音韻學研究的重點在於「語音史」的建構，相較之下，音韻學史的編纂與研究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羅常培(1929)之後，對《韻學源流》一書進行全面梳理、深入探究者並不多，據個人所見，僅殷孟倫(1963)與陳振寰(1988)二家而已。

殷孟倫(1963)最早全面評述《韻學源流》，其研究成果可概括為以下幾點：首先，分析《韻學源流》的編纂體例，追溯取材來源，解構全書的章節結構及其連貫關係，認為此書大多是抄錄前人之舊說，再稍加剪裁、補綴而成，極度缺乏原創性；其次，估量編纂者的音韻知識水平，認為編纂者的音韻知識仍停滯在乾嘉以前，篇中所引用之書主要為顧炎武《音論》、戴震《聲韻考》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種，不僅知識層面過於狹窄，且引文之中經常出現竄改顛倒或前後矛盾的弊病；最後，

² 韓震、董立河在《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一書的內容摘要中提到：「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對歷史學的理论研究是有意義的。這種轉向把重點轉到了歷史學家表述了什麼和怎樣表述的問題上，揭示了歷史語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識形態性，從而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內容提要，頁2)

殷孟倫（1963）推論《韻學源流》的性質，認為頗似清末塾師所編定的學堂講義，懷疑此書的原編纂者並非莫友芝³，而是一位「略通音韻之學的老先生」，故對於此書的價值持保留的態度，主張「必須對本書仔細核校，摸清底細，作出較詳的校訂，然後肯定優點，指出錯誤，這樣才對讀者有益。」（頁 441）

陳振寰（1988）回應殷孟倫（1963）的提議，詳細地對《韻學源流》進行全面地審訂與注評，除逐句檢證書中引述的事例之外，並加入個人的評語，或析評原作、或正謬補闕、或借題發揮，為今人研讀《韻學源流》提供了較為完善的注本。此外，陳振寰（1988）也對《韻學源流》編纂者的身分問題提出個人看法，他認為殷孟倫（1963）質疑此篇非莫友芝所作，但所列舉的證據卻不足以令人信服⁴，因而仍然傾向於贊同羅常培（1929）的意見，並進一步推測：《韻學源流》可能是莫與儔在遵義府學教授樸學時所編纂的課堂講義，後經莫友芝紀錄整理成篇。⁵關於此書的價值，

³ 殷孟倫（1963）懷疑《韻學源流》非莫友芝所編纂，所持的理由有以下幾點：1.此書編纂者的知識層面狹窄，以莫友芝的學識及交遊情形而言，所接觸到的音韻材料當不至於如此狹隘；2.以莫友芝當時的聲望，應不至於點竄他人的著作為己作而以自污；3.當時《四庫全書提要》（1782）已頒行天下，若此書為莫友芝所編纂，難道不會招致「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的批評；再者，若莫友芝膽敢妄自竄改欽命官修之書，難道不怕惹禍上身嗎？基於上述理由，殷孟倫（1963：441）推斷此書或為清末塾師所編。

⁴ 陳振寰（1988：2-4）對殷孟倫（1963）所提出的各項質疑，逐一加以澄清，指出：1.《韻學源流》涉及的音韻材料狹窄，或因音韻學並非莫友芝所長，且此書具有草稿性質，可能只是隨手整理的讀書札記，並未有想要刊印成書；2.引書未超出乾嘉以前，因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等名家之音韻論著刊行較晚，莫與儔、莫友芝父子蝸居貴州，或許未能親見研讀，加上莫友芝學術觀點趨於保守，非尚新求奇之人，故對於新興之學說未能大膽採納；3.乾嘉前後，引錄《四庫全書提要》而加以刪改者大有人在，不能據此判斷此書非莫友芝所編。

⁵ 陳振寰《韻學源流注評》前言，於 1988 年 5 月補記：「……找到《源流》原鈔本和羅常培初印本。從鈔本的款式、諱字（帝諱止於顛琰）足證《源流》為道光以前的作品。」（頁 8）若《韻學源流》果真成書於道光之前，那時莫友芝年歲尚幼，斷不可能獨力編纂此書。因此，陳振寰推論《韻學源流》的作者當為莫與儔，而非莫友芝。陳振寰的意見是否可信呢？有待商榷。白雪華、湛廬（2007：186）重新檢視陳振寰所提到的「原鈔本」，並對於陳振寰的說法提出質疑，理由是：「由於沒有其他關於鈔寫者的信息，我們似乎不宜判斷它就是『原鈔本』。……總的說來，其避諱字並未如陳振寰先生所說止於道光，而是顯得較為混亂，無法用來鑑定鈔本內容的時代，也無法推斷它是『原鈔本』。」白雪華、湛廬（2007：186-187）又依據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韻學源流》稿本，比對稿本字跡和莫友芝的鈐印習慣，判斷該稿本為莫友芝本人所抄寫，且細核其中避帝諱字，只避道光、咸豐二帝，而不避同治，知其抄寫年代應在同治之前的道、咸時期，而非道光之前，由此確認《韻學源流》作者為莫友芝。本文採納白雪華、湛廬（2007）的考證結果，認為莫友芝確是《韻學源流》的編纂

陳振寰認為《韻學源流》雖存在著若干缺失與謬誤，但仍不失為「理明事簡」的漢語音韻學史，對普及音韻學與音韻學史知識具有積極的作用。

如上所述，歷史文本不僅是史家對客觀史實的理性闡釋，同時也潛藏著個人主觀的詩性預構。因此，今人想要全面地、合理地評述《韻學源流》，也必須同時兼顧主觀／客觀、學科內部／學科外部的因素，不僅要深入理解文本究竟「說什麼」（文本內容），更要追問「怎麼說」（文本形式）、「為什麼這樣說」（編纂者的思想）。然而，綜觀羅常培（1929）、殷孟倫（1963）、陳振寰（1988）三人的評述，大抵是站在「語音史」本位來思考問題，關注「語音史」與「音韻學史」連結的側面，並且基於客觀主義史學的觀點來解讀、評述《韻學源流》，因而著重於探究文本「說什麼」，卻忘卻了應當轉換觀看角度，試著站「音韻學思想史」立場思考，追問編纂者「怎麼說」、「為什麼這樣說」，從而釐清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及其對《韻學源流》的敘述方式所產生的影響。

唯有同時睜開兩隻眼睛，大腦方能藉由雙眼視差（binocular parallax），精準地確定物體的方位與距離，從而產生深度感而能看見立體的影像；「語音史」、「音韻學思想史」是兩種不同的觀察視角，猶如雙眼之間存在的視差，在解讀、評價《韻學源流》時，必須同時整合來自這兩個視角所觀察到的信息，方能合理地賦予時代意義與價值。當代學者對《韻學源流》的歷史評價是否公允呢？各家有何對立、衝突的見解呢？如何從不同角度解讀《韻學源流》，為化解各家歧見建立起對話的平臺呢？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文擬參考「科學編史學」（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⁶的概念與方法，除關注《韻學源流》如何理性闡釋音韻學的發展源流外，更試著透過《韻學源流》的敘述方式，發掘文本所隱藏的詩學特質與意識形態。

本文主要內容有二：一、以《韻學源流》為研究對象，探究《韻學源流》的文

者。

⁶ 袁江洋（1997：40）解釋「科學編史學」的意涵，指出：「廣義科學編史學之主要任務在於：分析形形色色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分析科學在不同歷史時代及不同社會條件下的存在方式、在不同層面上的組織或建制形式及運作方式，分析科學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整體發展過程，如何理解科學、如何理解科學史這兩個重要問題，作出綜合性的回答。在此基礎上，重新探討科學史之目標、價值與意義，重新探討其研究範圍、方法論原則及評價標準。」

本內容與敘述模式，解析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二、檢視當代學者對《韻學源流》有何不同評價，試著調整彼此觀看問題的視角，提出更具全面性、概括性的評價模式，讓音韻學及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得以彼此對話。希望藉由本文之論述，補苴前人研究之缺漏，並對《韻學源流》的意義與價值有更深層的認識。

二、莫友芝的治學理念與教育志業

《韻學源流》全篇僅 19049 字（不含標點符號），內容則概括周秦時期至清代初期漢語音韻學的發展源流。根據陳振寰（1998：7）的統計與評估，書中提及各類人物有 251 人，各類書籍 296 種，術語 112 個，本書之編纂應是設定以「初通音韻學者」為主要對象，性質近似於學堂授課所編製的講義。莫友芝之所以編纂此書，除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外，更考量到實用的價值，這與他個人的治學理念與教育志業有關。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號邵亭，晚號眴叟，祖籍江南上元，高祖時遷居貴州都勻府獨山州。⁷莫友芝自幼從父親莫與儔（1763-1841）讀書識字，道光 3 年（1823）隨父親遷至遵義府學任所；道光 6 年（1826）拜皖派樸學大師程恩澤（1785-1837）為師，並於當年考取州學生員；道光 11 年（1831）考取鄉試舉人。莫友芝雖然少年登科，但不汲汲於功名利祿，平日研治許鄭之學，並旁及經史諸子、詩詞古文，或許因對時文帖藝未特別用心，致使此後科舉之途並不順遂，雖曾多次赴京應試，但均下第而返。

莫友芝半生以文化教育為志業，對遵義地區的文化傳播貢獻卓著。道光 14 年（1834）收胡長新為弟子，自此步上杏壇；道光 22 年（1842）受聘湘川書院主講；咸豐 6 年（1856）受聘啟秀書院講席；次年（1857），應貴陽知府劉書年之聘為西席。

⁷ 張裕釗〈徵君莫子偲墓誌銘〉云：「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眴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弘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為獨山人。」（《莫氏四種》，頁 477）

莫友芝晚年（1858-1871）逃避戰亂、遊歷江南，並專注於目錄版本學之研究，咸豐 11 年（1861）入曾國藩幕府，與劉毓崧（1818-1867，劉師培之祖父）、張裕釗（1823-1894）……等幕友詩歌酬唱、研討學問；同治 2 年（1863）獲唐寫本《說文》殘卷，刊行《唐本說文木部箋異》；同治 4 年（1865）遷居江寧（南京），應聘入金陵書局擔任校理；同治 6 年（1867），應丁日昌（1823-1882）之邀，暫留蘇州，整理「持靜齋」藏書；同治 7 年（1868）又應丁日昌之聘，任蘇州書局總校理，主持刻印《資治通鑑》294 卷；同治 9 年（1870）受聘為揚州書局校理；同治 10 年（1871）至揚州、興化一帶訪書，病逝於舟中。

莫友芝雖仕途失意，但在文化教育、編纂方志、收集貴州詩歌與文獻、詩文創作、書畫篆刻、目錄版本、語言文字之學……等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曾國藩讚譽曰：「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⁸與鄭珍（1806-1864）齊名，章士釗（1881-1973）并譽之為「西南兩大儒」。⁹莫友芝博學多能、著作等身，比較重要的著作有：《黔詩記略》、《遵義府志》（與鄭珍合纂）、《聲韻考略》、《過庭碎錄》、《邵亭詩抄》、《樗齋譜注》、《唐本說文木部箋異》、《持靜齋藏書紀要》、《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

在音韻學研究上，莫友芝著有《聲韻考略》4 卷、《韻學源流》1 卷，其中《聲韻考略》今已不見流傳，羅常培（1929）猜測《韻學源流》或為《聲韻考略》之初稿，經後人輾轉抄錄成編。¹⁰《韻學源流》以簡潔文字概述一千六百年來漢語音韻

⁸ 咸豐 11 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曾國藩寄給其子曾紀澤的家書，寫道：「字諭紀澤兒：昨見爾所作《說文分韻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因請莫君指示錯處。莫君名友芝，字子偲，號邵亭，貴州辛卯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鬯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凡例》寄去……。」轉引自梁光華（2011：123）。

⁹ 吳鵬、簡小娅（2012：72）：「近人章士釗《訪鄭篇》詩所贊：『西南兩大儒，俱生牂柯巔』指鄭（鄭珍）、莫（莫友芝）二人。」

¹⁰ 《韻學源流》源自於趙幼愚的校抄本。1918 年，康寶忠將此書刊印出版，並撰序文說明其來歷，云：「莫子偲《韻學源流》一卷，為遵義趙幼愚校鈔本。劉申叔入蜀時，幼愚以貽申叔者也。是書海內既無刊本，余所得者又為幼愚、申叔所校定，固應以公同好，而不可自秘也。」（頁 1）羅常培（1929：29）推測此書本源，云：「考黎庶昌《莫徵君別傳》及張裕釗《莫子偲墓誌銘》，均載《聲韻考略》四卷，而不及此書，意此書或即《聲韻考略》之初稿而展轉傳抄者耳。」

學發展的軌跡，堪為漢語音韻學史的奠基之作。為何編纂音韻學史的使命會落在莫友芝身上？除了歷史機緣之外，莫友芝本身具備何種學術條件？編纂此書又是基於何種目的呢？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一）內因——以許鄭之學為本、旁及金石目錄

史家的理想目標，蓋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想要達成此一理想目標並不容易，就音韻學史的編纂而言，編纂者不僅得要熟悉歷來各類音韻學著作之來龍去脈，並且得對語音的歷時演變過程有所認識。莫友芝是否具備了編纂音韻學史的相關知識呢？張裕釗〈徵君莫子偁墓誌銘〉描述莫友芝的學術背景，指出：

（莫與儔）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偁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偁相廝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偁、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偁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偽，無銖寸差失。（《莫氏四種》，頁477-478）

莫友芝自幼篤治許鄭之學、熟知漢學門徑，其學術造詣之精深曾讓曾國藩大為讚嘆。¹¹然則，莫友芝生長於西南偏遠之地，為何能夠精通音韻之學呢？追溯莫友芝音韻學之淵源，不難發現有兩位關鍵人物對他影響至鉅：莫與儔與程恩澤。

1、莫與儔的啟蒙

莫與儔，字猶人，為嘉慶4年（1799）進士，曾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在任職翰林院期間，曾與阮元（1764-1849）、紀昀（1724-1805）、洪亮吉（1746-1809）、張惠言（1761-1802）、郝懿行（1757-1825）、姚文田（1758-1827）、王引之（1766-1834）等漢學大家往來問學¹²，對於乾嘉樸學有深入接觸。莫與儔兼治漢、宋之學，在棄

¹¹ 黎庶昌〈莫徵君別傳〉：「丁未（1847）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漢學門戶，文正大驚，扣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儒耶！』」（《拙尊園叢稿》，頁310）

¹² 莫友芝〈顯考莫公行狀〉云：「蓋公少時所治，唯取士五經，及成進士，座主則相國朱公珪、劉公權之、阮公元；又師事相國紀公昀、編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編修張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

政從教之後，以「六經宗伏鄭，百行法程朱」¹³作為教育準繩，對自家子弟督課甚嚴，精選訓詁典籍及當朝名家論著作為子弟必讀的課本，莫友芝〈顯考莫公行狀〉云：

逮授子友芝經，乃令以雅故為本。至遵義，悉購集漢、宋經說，及本朝專門名家者置座右，手日披覽。謂友芝曰：「學者立身行己，當法程、朱，輔以新吾（呂坤）、蘇門（孫逢奇）、潛庵（湯斌）、稼書（陸隴其）之篤近。若言著述，我朝大師相承，超軼前代矣。」每舉惠氏《易》、閻氏《書》、胡氏《禹貢》、陳氏《詩》及諸言《禮》家說精核絕者，為友芝指講。即嘆曰：「吾少也，不及知，知之矣，又無所得書，今書十九備而吾已老。若輩不及今為之，亦何及矣！」（《莫友芝詩文集·邵亭文補·卷二》，頁769）

莫與儔長年擔任遵義府學教授，日以樸學教授鄉里子弟，開啟了遵義地區鑽研乾嘉樸學的風氣。陳田（1850-1922）《黔詩記略後編》「莫與儔傳證」云：「吾黔講宋學以定齋（陳法，1692-1766）為大宗，黔士之有漢學，自先生始。厥後先生之五男友芝、門人鄭珍、珍子知同，以考據訓詁之學成書數十種，出與海內碩學證據，推為漢學專家。先生提倡之功偉矣！」¹⁴由此可知，正是在父親莫與儔的啟蒙之下，莫友芝得以自小接觸清代漢學大師的一流著作，儲備日後編纂《韻學源流》的音韻知識。

2、程恩澤的教導

程恩澤（1785-1837），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自幼聰穎過人，稍長從凌廷堪（1757-1809）遊學，盡造其閫奧。從嘉慶9年（1804）中舉，16年（1811）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3年（1823）任貴州學政，6年（1826）轉任湖南學政，14年（1834）授工部侍郎，轉戶部，17年（1837）卒於位。程恩澤博

書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講六書、明漢學者數十計，故熟于國朝大師家法淵源。」（《莫友芝詩文集·邵亭文補·卷二》，頁768-769）

¹³ 莫友芝〈答萬錦之全書〉：「昔先君之教人也，必舉閻徵君（按：閻若璩）『六經宗伏鄭，百行法程朱』之榜以樹依歸。老兄及門時，當亦所熟聞矣！」（《莫友芝詩文集·邵亭遺文·卷五》，頁619）

¹⁴ 轉引自史繼忠（2010：100）。

學強記、精通考據之學，為清中期皖派樸學的知名學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評論其學術成就，云：「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靡不精究。」（頁 233）

在程恩澤任貴州學政期間（1823-1826），莫友芝與鄭珍二人拜程恩澤為師，皖派樸學以辨音識字為基礎的治學理念，勢必也對二人造成深刻的影響。鄭珍晚年有詩追憶學習過程，云：「我為許君學，實自程夫子。憶食石魚山，笑余不識字。從此問鉉錯，稍稍究《滂喜》。相見越七年，刮目視大弟。為點《新附考》，詡過匪石氏（按：鈕樹玉）。公時教惠王，歸沐輒奉几。……」（《巢經巢詩後集》，卷 2，頁 11）顯見正是在程恩澤的指導之下，鄭珍才步入漢學之門徑，並且在經學、小學上取得傑出的成就。莫友芝同樣也曾受到程恩澤的指導，道光 15 年（1835）冬，莫友芝整裝北行，以應來年春試，當時程恩澤在京師任戶部侍郎，鄭珍作〈追寄莫五北上〉一首¹⁵，勉勵莫友芝飽覽山川風光，並至京師拜謁阮元、程恩澤兩位漢學大師，請教漢學之淵源。可見莫友芝之所以能精熟「蒼雅故訓」之學，程恩澤曾經扮演過指導者的角色。

（二）外緣——以文化教育為志業

在莫與儔與程恩澤的啟蒙、教導下，莫友芝致力研治文字訓詁之學，奠定日後編纂《韻學源流》的知識基礎。然而，具備音韻知識僅是編纂音韻學史的必備條件，必須還要其他外在因素配合，方能付諸實現。試想：清代晚期，精通乾嘉樸學者不乏其人，為何莫友芝特別動心起念，想要編纂出能會通古今源流的音韻學史呢？觸發莫友芝編纂《韻學源流》的外在因素為何？考察莫友芝的時代背景與生活環境，個人以為：《韻學源流》之編纂，與莫友芝半生獻身於文化教育事業有關。

貴州為古夜郎之地，因地理環境阻絕、遠離中原文明的核心，故自古以來被視為偏僻、蠻荒之絕域。然而，清嘉慶以迄光緒年間，在黔北遵義的樂安江畔，卻意

¹⁵ 鄭珍〈追寄莫五北上〉詩云：「……子今偕計趨春官，歷鍊駿骨閱山川。河聲嶽色浩漫漫，吞納胸中同鬱盤。獨慨宿學近頗慳，罕聚輦轂散若煙。阮程二老海內觀，子往謁之問淵源。必有告子乎勉旃。」（《巢經巢詩集》，卷 3，頁 6）

外地綻放出異常燦爛的文明火花，形成所謂「沙灘文化」¹⁶，莫友芝正是建構「沙灘文化」的重要柱石之一。「沙灘文化」的特徵，誠如黎鐸（2010：113）所言：「由家族血緣、姻親關係及師友關係為紐帶，構成一個相對完整、富有地域特徵的文化體系（單元），有著鮮明的親緣性和輻射性」，而維繫、拓展「沙灘文化」的無形力量便是——教育。¹⁷

莫友芝出身於教育世家，祖父莫強（字健行）為鄉里塾師，父親莫與儔更是將畢生心力投注在教育事業之中。嘉慶6年（1801），莫與儔於翰林院散館之後，改任四川鹽源知縣，後因父喪返鄉；服喪期滿之後，又以奉養母親張太孺人為由，請求暫緩返任，於獨山兔場闢「影山草堂」教育鄉里子弟，並應本州之聘主講「紫泉書院」，前後凡十八年；母歿之後，莫與儔毅然決定棄政從教，於道光2年（1822）呈請改任遵義府學教授，任職達十九年之久，於道光21年（1841）卒於任所。

莫與儔依循著儒家「經世致用」的理念，曾撰寫〈示諸生教〉四篇以闡發個人的教育思想。從〈示諸生教〉四篇中，可看出莫與儔十分注重品德教育，強調為學應以端正志向為先，要求學生須明義利之辨；主張讀書應當講求實用，而非只是吟詠章句，應從經典中體悟到為人處事的法則，切不能以獵取功名利祿為讀書的主要目標，要能深切體會安貧樂道的道理。此外，莫與儔對於提倡漢學不遺餘力，因深感西南地區文風不盛，特別在遵義府學之內籌建「漢三賢祠」，奉祀漢朝三位貴州先賢——韋為文學（舍人）、盛覽與尹珍，作為黔中學子學習仿效的典範。鄭珍〈漢三賢祠記〉紀錄莫與儔建祠之緣由與用意，云：

¹⁶ 根據黃萬機（2010）的研究，「沙灘文化」的概念是出自於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編纂的《遵義新志》。該志主編張其昀在「歷史地理」章中，將遵義兩千年來的發展歷史分成九個時期，其中第八期即為「沙灘期」，《遵義新志》描述此時期以黎氏為主體、鄭氏與莫氏為兩翼所發展出的區域文明，云：「沙灘黎氏為遵郡望族，先世自四川廣安縣遷來。自清乾隆以後，世有賢才。……黎恂字雪樓，於嘉慶十九年（1814）舉進士，官浙江桐鄉縣知縣。浙省素為人文淵藪，頗廣見聞，嘗曰：『人以進士為讀書之終，我以進士為讀書之始。』歸黔後，以廉俸萬金購置書籍。鄭珍（字子尹）以甥行，莫友芝（字子愚）以年家子（其父與儔，字猶人，為遵義府學教授，遂自獨山移家於此），皆從恂治樸學。其後鄭珍、友芝蔚為一時宗匠，號稱『西南大師』。姪黎庶昌（字蓴齋）師事曾文正公，從事經世之學。鄭、莫、黎三家，互為婚姻，衡宇相望，風流餘韻，沾溉百年。」（頁236）

¹⁷ 教育是「沙灘文化」孕育、形成的關鍵要素，相關討論請參見黎鐸（1995）、石尚彬（1997）、史繼忠（2010）、黃萬機（2010）等人的論述。

莫公呼來告曰：……建元之際，弟子著錄者漸多，齊魯晉燕趙吳楚梁越之間乃始，諸儒雲爛霞蔚，六經賴以復傳。於時西南遠徼，文翁為之倡，相如為之師，經術文章燦焉，與鄒魯同風，而文學公、盛公即以其時起於牂柯犍為。東漢以後，儒者始不專一家講說，至許鄭集漢學大成，而尹公乃即起於毋斂。樸常獨居，深念六經堂構於漢儒，守成於宋程朱數子，而大敗壞於明人。及我世祖、聖祖崇樸學，教化海內，一時朝野諸老宿痛懲前代空疏文巧之佛老，吾道而力挽回之，事必求是，言必求誠，支離恟恍之習掃棄淨盡，於是漢學大明，六經之義若揭日月，至今二百年來，數天下鏗鏗說者，一省多且得數十人，獨西南士僅僅，意無乃淵源俎豆之不存歟。（《貞定先生遺集·附錄》，頁 217-219）

除了留心學校教育外，莫與儔對於家庭教育更是注重，莫友芝曾將父親平日的教誨、訓示，輯錄成《過庭碎錄》12卷。莫友芝從小耳濡目染，深受莫與儔教育思想的啟迪，在屢試不第的情況下，亦追隨莫與儔的腳步，半生以文化教育為職志。考察莫友芝的生平事蹟，《韻學源流》應是執教期間（1842-1859）所編纂的授課講義。陳振寰（1988：4-5）推測：「如果認為《源流》頗像學堂講義，我們倒寧願設想它也許是莫與儔在遵義府學『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時的講義而為友芝紀錄整理成篇者。」

莫友芝精熟漢學之淵源與發展，具備編纂音韻學史的基本能力；再者，因長期執教於黔省各書院，必須思考如何將音韻學的發展脈絡以簡明方式教授給鄉里子弟。在內因與外緣聚合之下，便激發出想要編纂音韻學史的衝動。

三、《韻學源流》的內容、形式與音韻史觀

如何客觀評價史書的優劣良窳呢？唐·劉知幾（661-721）認為史家必須具備「史學」、「史才」、「史識」三種長才。¹⁸所謂「史學」是指**學識**，即史家不僅對歷史對

¹⁸ 《新唐書·劉子玄傳》卷 132，記載劉知幾（字子玄）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的對話，云：「史有三長：

象有深厚的專業知識，並且還得旁及其他相關的知識¹⁹；「史才」是指文采，史家必須能夠蒐集、鑑別、組織史料，即具備善於敘述、精於編纂的能力；「史識」則是史觀，指史家能以獨到的歷史眼光，判別個別事件的歷史意義、梳理事件的發展始末、論證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劉知幾所提出三項史家長才，無疑為我們評鑑音韻學史著作提供判準的依據；換言之，當我們評述《韻學源流》時，也應當分別審視「史學」、「史才」、「史識」三個層面，如此方能對《韻學源流》的意義與價值有更全面性的認識。

（一）《韻學源流》的韻學知識

如上文所述，莫友芝自幼篤治許鄭之學，並旁及金石目錄，依照常理推論，莫友芝對於歷代音韻學著作及音韻演變過程應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若剖析《韻學源流》的內容，能否看出編纂者確實具備深厚的音韻學知識呢？對此問題，學者的見解不同、褒貶不一。殷孟倫（1963：434-438）持負面評價，認為《韻學源流》編纂者的知識面十分狹窄，並列舉出以下幾點證據：

- 引用的各書主要不過三種：顧炎武《音論》、戴震《聲韻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餘引用的書絕少。
- 或整段抄錄前人舊說，或稍加竄改顛倒以為己作，未能摭發自己閱讀第一手材料後的心得與看法。
- 多襲用前人謬說，以為定論，未能吸納後人研究成果予以更正。例如：書中引顧炎武《音論》談「韻」字始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曾對顧炎武的說法提出糾正，且閻說為戴震《聲韻考》所引，但編纂者未能注意。

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列傳第五十七，頁4522）

¹⁹ 音韻學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與社會文化的演進有著緊密聯繫。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導言》指出編寫音韻學史，必須注意音韻學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云：「一般文化的演變，對於某種學術，也往往直接的或間接的增進了它研究時所必須的基本智識，供給了它研究時所應用的某種新工具，擴大了它研究時所採取的材料和門徑。因之，我們要窺探一國裡某種學術演進的情形，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國家在一般文化上曾經發生過幾次的變動，以及這些變動對於促進這種學術的研究，有怎樣關係。」（頁1）

- 以「反切」與「古韻」、「今韻」對立，對音韻學範疇的概括不夠仔細，容易產生混亂。
- 抄錄舊說，存在著前後矛盾的現象。例如：論述「古韻」，抄錄顧炎武《音論》，認為「韻」字始見於(晉)陸機〈文賦〉；論述「今韻」，則改寫戴震《聲韻考》，認為魏武、杜夔均有「韻」字，推論韻學應興於漢建安中。

相較之下，陳振寰（1988：5-6）則抱持著寬容的態度。雖然也指出《韻學源流》的矛盾與瑕疵之處，但大體上仍舊肯定編纂者的音韻學根柢，並試著歸納出《韻學源流》中幾項有價值的新見解，茲將陳振寰（1988）的舉證引述如下：

- 《韻學源流》：「六書之諧聲即韻也。」編纂者意識到「同聲必同部」的道理。
- 《韻學源流》：「顧炎武因之而精，著《音學五書》及《韻補正》；江永又因炎武書而益精之，撰《古韻標準》，於是古音之道揭日月而行，後有作者，雖有更小密而二家，亦其支流而已。」編纂者或許意識到「考古」、「審音」這兩條古音學發展路徑。
- 《韻學源流》：「豈《廣韻》二百六韻之目，即法言舊部歟？法言〈序〉既舉支脂仙先等為說，則分部又必不自法言，豈自《聲類》即已有此等部，而四聲既興，又以四聲界之耶？法言又云，諸家有乖互，豈合諸家之部分而去取整齊之耶？」編纂者認識到：李登《聲類》可能已分韻列字；陸法言《切韻》是參酌各家分韻所制訂出來的；《廣韻》二百六韻並非全然來自陸法言之分韻。
- 《韻學源流》：「《廣韻》三鍾恭字下注云：『陸以恭蝨縱等入冬韻，非也。』此當是錄唐人舊注駁正法言處。因隋唐舊書嚴於辨聲，不徒為屬文取韻，雖冬鍾同用，而煩剖晰及是，亦可見字有移附，豈部分獨無移并歟？」編纂者認識到：《廣韻》韻次較之《切韻》原貌，已是經過後人調整而有所移并。
- 《韻學源流》：「第光《傳家集》中，下至〈投壺新格〉之類無不具載，不知何以不載此書，豈本附官修《集韻》後歟？」編纂者懷疑：《切韻指掌圖》應是後人偽托之作，並非出自司馬光之手。

莫友芝編纂《韻學源流》，其目的在於總結前人研究成果，釐清韻學發展的脈絡，以此作為課堂教材，讓鄉里學子對音韻學之淵源與發展有基本認識。因此，大抵上採取「述而不作」的態度，儘管其中也透露出若干個人的看法，但全篇大部分的內容是直接抄錄自前人的評述，或者只是稍加縮略、改寫而已。殷孟倫（1963）窮本溯源，解構《韻學源流》的取材來源，嚴厲批判編纂者蹈襲舊說、欠缺原創性；相較之下，陳振寰（1988）除指出《韻學源流》的缺失之外，更試著發掘出編纂者的先進觀點，並指出其中與後代研究結果暗合之處。²⁰殷孟倫（1963）、陳振寰（1988）對《韻學源流》的評價，看似一貶一褒，實則兩者只是評判標準有寬嚴之分，並沒有出現針鋒相對的歧見。

（二）《韻學源流》的敘述形式

漢語音韻學淵遠流長，歷代音韻學家留下眾多文獻史料，史家必須展現個人的「史才」，予以恰切剪裁、妥善安排。莫友芝編纂《韻學源流》雖採取「述而不作」的態度，但在「述」的過程中，實際上已隱含著「作」的創意因子，因此今人解讀《韻學源流》，除了追溯取材來源之外，我們更應當注意莫友芝如何剪裁、安排，如何展開敘述，特別是篇幅的長短、編排順序先後、語料取捨存留……等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尤其不能輕易放過。因為歷史文本的敘述方式，往往也蘊涵著編纂者的主觀意圖，非但有助於探索史家所預想達到的目的或功能，更可進一步發掘文本中潛藏的音韻學史觀。

如前所述，《韻學源流》大多引錄前人既有說法，其間穿插自己語言加以綴補、銜接²¹，雖然全篇看似條理分明、一氣呵成，但在原創性上卻是明顯不足。對於《韻學源流》的取材來源與撰寫方式，殷孟倫（1963）有過深入地觀察，指出：

²⁰ 羅常培（1929：29）讚揚莫友芝對於隋唐韻書之韻部移并關係有精準的認識，云：「其所致疑，並皆精闢。曩使子偲得見唐寫本《切韻》、《唐韻》殘卷，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則隋唐韻書部次先後，或不逮王靜安先生考訂已秩然可觀。」

²¹ 殷孟倫（1963）認為《韻學源流》是由前人舊文剪裁、補綴而成，其中用來貫穿、銜接前後文句的語言稱之為「關合的語言」。殷孟倫（1963：431-439）依照語句分佈的狀態，將用來關合的語言細分成六種類型。詳情請自行參閱。

把本書文字分成兩方面看，一是原編者引用他人的語言，一是自己敘述的語言，經核對結果，後者佔全書約十分之一強。原編者引用他人的語言，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提明出於何書何人的，另一種則是引用而並未提明出於何書何人的，而未提明的又佔絕大的比例。自己敘述的語言當中也有不完全出於自己摭發的情形。其大致如此。但原編者文學修養高，全文組織成一篇文章，從頭到尾，條理分疏，而又一氣呵成，因此看上去好似所有材料出於一人手筆，必須仔細爬梳，始能知道從某起到某止是引用何人何書之說。(頁 423)

《韻學源流》既以「源流」為名，目的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故將音韻學發展比喻成一條歷史長河。《韻學源流》篇首總綱：「音韻之道有三：曰古韻、曰今韻、曰反切。」(頁 1)莫友芝認為音韻學長河分派出三大支流，書中對於各支流的描寫，遵照著一致的敘述模式，即：先追溯韻學的初始源頭；其次論述韻學發展主流趨勢，旁及主流之外所派生的支脈；最後，總結整體發展趨向及其實際功用。

1、古韻之學

《韻學源流》首論古韻之學的發展源流，依據內容安排與敘述先後，可將此部分的章節架構拆解成以下幾個段落：

- (1) 追溯「韻」字起源與意義。
- (2) 論述「古韻」的形成，以及魏晉至隋唐間的叶韻說、韻緩說。
- (3) 分別評述各家古音學說：宋·吳棫《韻補》(旁及宋·程迥《音式》、元·戴侗《六書故》)；明·楊慎《古音叢目》(包含《古音彙要》《古音餘》《古音附錄》)、《古音略例》與《轉注古音略》、明·陳第《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清·顧炎武《音學五書》(旁及清·毛奇齡《古今通韻》；清·柴紹炳《古韻通》)、清·江永《古韻標準》。
- (4) 總論古韻學的發展趨向及優劣得失，並點出研究古音學的目的。

《韻學源流》的剪裁與安排，是否能體現古韻學發展的整體趨勢呢？敘述形式是否

有所偏差、有所失衡（overregularity）²²？為檢驗《韻學源流》的對於古韻學史的建構是否公允、客觀，不妨以同時代古韻學家——江有誥（?-1851）的說法作為參照。江有誥《音學十書·詩經韻讀·古韻凡例》概括古韻學發展歷程，云：

自周、沈四聲定而古音失，法言《切韻》作而古音之部分失。（宋）吳才老首復古韻，特未免隨文遷就，於古之正音、古之部分，蓋茫乎未之知也。鄭氏庠作《古音辨》始分六部，雖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韻。蓋專就唐韻求其合，不能析唐韻求其分，宜無當也。（明）陳季立始知叶音即古本音，誠為篤論，然於古韻部分亦未之知也。國朝崑山顧氏始能離析唐韻以求古韻，故得十部，然猶牽於漢以後音也。婺源江氏始專就三百篇以求古韻，故得十三部，然猶惑於今人近似之音也。金壇段氏始知古音之絕不同今音，故得十七部。古韻一事，至今日幾如日麗中天矣！取而譬之：吳才老，古音之先導也；陳季立，得其門而入也；顧氏、江氏則升堂矣；段氏則入室矣。（頁1）

比較莫友芝、江有誥二人對古韻學史的看法，可以發現：二人的論述大致相符，可證明《韻學源流》的剪裁與安排應是公允、客觀的。然而，透過二家之對比，我們仍然可看到《韻學源流》有幾個敘述失衡之處，一是對於楊慎古韻學過度著墨；一是敘述僅止於顧炎武與江永，未及戴、段、孔、王諸家。

◆對楊慎古韻學過度著墨

雖然楊慎（1488-1562）撰寫多本古音學著作，但其學術成就並非特別耀眼，莫友芝《韻學源流》即以「瑕瑜雜糅」四字總評楊慎的古音學論著（頁4）。既然楊慎古音學存有瑕疵，為何《韻學源流》對於楊慎古音學著墨特多？陳振寰（1988：71）亦對此敘述失衡現象感到詫異，並提出批評，指出：「《源流》古韻部分總計不足七千字（連標點在內），楊慎一人竟佔去一千八九百字，四分之一以上篇幅，詳略失當，顯而易見。之所以如此，歸根到底還是由於《源流》作者對他所評介的對象缺少研究（更勿論深入細緻研究），照抄照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陳振寰（1988）將

²² 「失衡」是功能文體學的術語，用以指稱文學作品中某些語言特徵出現頻率超出常規或低於常規，從而引起讀者注意而產生凸顯的效果。本文則借用「失衡」指稱《韻學源流》對某些韻學著作的敘述份量過多或過少的情形，據此推測編史者的編纂意圖與音韻學史觀。

《韻學源流》敘述詳略失當，歸因於編纂者「缺少研究」、「照抄照搬」，但如此解釋是否合理呢？恐怕值得商榷。

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是明代中期的知名學者，以博學多能、著作豐富見稱於世，王世貞（1526-1590）《藝苑卮言》（卷 6）云：「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修。」（頁 321）嘉靖 3 年（1524），楊慎因議禮獲罪而謫戍雲南永昌，此後三十五年都在西南地區度過，因長年居住、往來於川滇黔地區，與當地的文人學士交遊唱和，並對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進行收集與整理，對於西南地區的文化傳播具有高度影響力。²³個人以為，《韻學源流》之所以對楊慎古音學著墨最多，既不是基於楊慎在古音學上的傑出成就，也不是因為編纂者「缺少研究」、「照抄照搬」，有可能是基於地緣因素，考量到楊慎學說在西南地區的影響力。何九盈（2002：87）強調語言學史編纂者應具備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要能分辨「影響」與「成就」，且堅持以學術成就作為是否列入史冊的標準，但莫友芝似乎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

◆不及戴段孔王諸家

為何《韻學源流》之敘述，至顧炎武、江永而止，未及戴段孔王等名家之學說？羅常培（1929）、殷孟倫（1963）均對此提出質疑。陳振寰（1988：4）歸納出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等人的古韻學論著，都是在莫與儔五十歲之後，蝸居貴州教習時所刊布的，莫與儔、莫友芝未能親見並研讀之；二是，莫友芝的學術觀點偏向保守，並非尚新求奇之人，鄭珍〈邵亭詩鈔序〉曾描述莫友芝的治學風格，云：「其讀書，謹守大師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舉形聲、訓詁，或一二說異許鄭處似之，雖遽無以臨詰，意顧不善也。」（《巢經巢文集》，卷 4，頁 7）因此，對於刊行不久的古音學新論，莫友芝或未及注意、或未能遽然接受。

除上述兩項可能的因素之外，應該還要考慮到《韻學源流》的編纂目的。《韻學源流》近似教學用的課堂講義，「課堂講義」與「專業論著」無論在閱讀對象或撰寫

²³ 武誼嘉（2009：72）：「明代是西南地區特別是川滇地區文學的昌盛時期，人才輩出，詩文如林。這主要是洪武三年起，開科取士，促使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結果，也與這一帶，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分不開。而楊升庵在這一帶與各族人民接觸，交友講學，著書立說，創作詩文所造成的影響也是功不可沒。」

風格上均有所差異，前者的目的在於普及音韻學知識，反映已被學界普遍接受的研究成果；後者則是為了建構新知、闡發一己之創見。《韻學源流》既是以普及音韻學知識為本，對於已被當時學界普遍認可的學說（顧炎武、江永古音學）必須納入，至於戴、段、孔、王等名家之新論，雖饒有創意，但日後是否能被學界普遍接受？仍有待時間考驗。因此，《韻學源流》未敢冒然納入，這也是合乎情理的作法。

2、今韻之學

陸法言《切韻·序》：「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新校宋本廣韻》，頁 13）《切韻》考量「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冀能同時兼具辨析聲韻（賞知音）、詩文用韻（廣文路）兩種功能。然而，自宋代以降，士人使用韻書日益注重作文應試的現實需要，有鑑於《廣韻》、《集韻》這類以審音為主的韻書過於詳密、龐大，為求臨文用韻之簡約、便捷，遂將韻書中註明「同用」之韻加以合併，從而編纂出《禮部韻略》這類專供科舉考試使用的韻書，此即為後世所謂「詩韻」或「平水韻」。

《韻學源流》第二部分，評述與「今韻」相關的韻學論著。莫友芝將「今韻」界定為「隋唐以來，歷代詩家承用之譜」（頁 10），評述焦點集中在科舉應試的韻書及其歷史沿革上。依照文中的內容安排與敘述先後，可將章節架構分解成以下幾個部分：

- (1) 追溯韻書的起源；
- (2) 追溯「四聲」的起源；
- (3) 評論歷代各家韻書：南朝·沈約韻書（旁及《隋志》著錄之韻書）；隋·陸法言《切韻》（旁及《唐志》著錄之韻書）；唐·孫愐《唐韻》、唐·顏真卿《韻海鏡源》、唐·李舟《切韻》；《廣韻》（旁及夏竦《古文四聲韻》）、《集韻》、《景德韻略》、《景祐韻略》、宋·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韻釋疑》、宋·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宋·楊伯喆《九經補韻》、宋·劉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略》（旁及《宋史》著錄之韻書）；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元·陰時夫兄弟《韻府群玉》；《洪武正韻》。

若與現行的兩本音韻學史——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周斌武《漢語音韻學史略》相比，不難發現：《韻學源流》存在著敘述失衡之處，一是欠缺《中原音韻》系統的北音韻書；一是特立專節討論顏真卿的《韻海鏡源》。

◆欠缺《中原音韻》系統之北音韻書

「詩韻」是元、明、清七百年間讀書人作詩用韻的標準，本身具有規範性與保守性，逐漸與口語脫節而淪為書面上的死語，無法反映現實語音的變化，對於漢語語音史研究價值不大。金、元以降，政治經濟中心移至北京，元代劇曲用韻講究貼近市民階層的口語，自然而然以北方語音為基準，從而發展出以《中原音韻》為代表的北音韻書，如：卓從之《中州音韻》、蘭茂《韻略易通》、畢拱辰《韻略匯通》、樊騰鳳《五方元音》……等。北音韻書是研究近代漢語共通語音系的重要材料，張世祿（1938）、周斌武（1987）二人所編纂的音韻學史，均專立章節介紹北音韻書，但在《韻學源流》中，北音韻書卻明顯遭到冷落。對於《韻學源流》刻意迴避北音韻書，陳振寰（1988：105-106）提出批判：

作為一部音韻史，卻無視影響巨大的以《中原音韻》為代表的北音韻書更是不可原諒的錯誤；即使專論《廣韻》到《詩韻》和《詩韻》的各種改訂本，所謂「詩家承用之譜」，也不能像《源流》今韻部分那樣只作概略的、表面的和外在形式繼承關係的介紹，而不作聲韻系統的歸納、綜合、比較，不論及音韻學家等韻對《廣韻》系統韻書的關係，不論及音韻學家對《廣韻》音系的研究成果。《源流》的粗率、單薄是一目了然的，我們只能為之遺憾。

如此，足以顯示：莫友芝篩選韻學著作有其個人獨特的觀點，且與當代音韻學史編纂者的評選眼光有所不同。對於此種觀點上的偏移與落差，我們不應當「以今律古」，站在今人立場批判前人的偏差，而應當抱持「瞭解之同情」²⁴，試著站在前人立場思考：莫友芝如此篩選，其背後究竟隱含著何種編纂理念？表徵何種音韻學史觀？

²⁴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頁 507）

如此一來，對比古今評選標準的落差，無疑為我們開啟一扇窗口，讓我們得以進一步窺探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

◆專節討論顏真卿《韻海鏡源》

顏真卿（709-785）《韻海鏡源》是「以韻隸事」的類書，書中輯錄經史子集之中二字以上成句的詞語²⁵，其目的在於為文人作詩提供韻藻，其功能與《韻府群玉》、《佩文韻府》相似。謝啟昆（1737-1802）《小學考·聲韻二》（卷30）「韻海鏡源」下，另加按語云：「是書為後人韻府之濫觴，本無關小學，以自來著錄皆列小學中，姑仍其舊，後此《韻府群玉》之類皆不入焉。」（頁490）

《韻海鏡源》篇帙浩繁，雖可作為士人臨文賦詩之參考，但其內容、體例均與一般韻書有別，是以張世祿（1938）、周斌武（1987）二人所編纂的音韻學史，均未納入此書。反觀《韻學源流》，卻對此書多所著墨，陳振寰（1988：105-106）對此一失衡現象亦提出批評，指出：「《鏡源》於分韻編排方面全依《切韻》，並無發展創建；而其書早已亡佚（宋時僅餘十六卷，不到二十分之一），影響很小。作為語音學史，一帶而過可矣，不必花這麼大的篇幅，專節討論它。由此，我們又一次看到《源流》存在著的因手頭材料而設置節目，缺乏周密組織、剪裁功夫的缺點。」

3、反切之學

乾嘉樸學主張知音與識字為通達經義之根本，反切之學自然成為士人必備的基礎知識。李汝珍（1763-1830）《李氏音鑑》闡述切音之學的重要，云：「竊謂欲讀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知音，欲知音必先翻切，欲明翻切則非字母不可也。」（卷3，頁18）

《韻學源流》第三部分，便是追溯「反切」發展源流，並評述相關的韻學論著，這類著作在漢語音韻學的學科體系中，通常歸屬於「等韻學」的研究範疇。以下依

²⁵ 《韻海鏡源》今已亡佚，該書之內容、體例與命名理據，備載於《真卿集》之〈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韻學源流》引述碑文記載：「真卿曩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頁14）

據內容安排與敘述先後，將章節架構拆解成以下幾個部分：

- (1) 論反切的起源。
- (2) 論南北朝的特殊反語——兩字顛倒紐之、兩偏旁合為反語。
- (3) 論反切之名及其演變。
- (4) 評論宋元等韻圖：「華嚴字母」、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旁及《廣韻·雙聲疊韻法》、《玉篇·五音聲論》）、司馬光《切韻指掌圖》（旁及鄭樵《通志·七音略》）、《四聲等子》、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 (5) 批評戴震《聲韻考》的說法，辨析字母源自西域。
- (6) 評述明清等韻字母：蘭茂《韻略易通》、濮陽涑《韻學大成》、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無名氏《并音連聲字學集要》、葉秉敬《韻表》、呂維祺《音韻日月燈》、喬中和《元韻譜》、桑紹良《青郊雜著》與《文韻攷衷》、馬自援《等音外集》。
- (7) 認為元·朱宗文《蒙古字韻》、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亦資見聞、無與經典²⁶」；闡述學習音韻學的目的。

與張世祿（1938）、周斌武（1987）之音韻學史相比，《韻學源流》對於等韻著作的敘述也有明顯失衡之處：

◆介紹明清等韻論著過於簡略，且只論及字母問題

《韻學源流》對於韻圖之評述，集中在《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四聲等子》三本宋元韻圖上。儘管明清等韻論著數量繁多，但《韻學源流》論及明清等韻的篇幅卻是十分單薄，試看：全篇末段不滿五百字，卻概述了明清十部等韻論著，每本著作僅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此外，篇中僅論及字母的分類及其發展，對於

²⁶ 「無與經典」一句，羅常培（1929）本寫作「無異經典」；陳振寰（1988）改為「無益經典」。饒文宜、梁光華（2009：31）以手稿本重新校訂，改為「無與經典」。並加以解釋：「『與』，此作動詞『參與』解，可解譯為『列入』。『亦資聞見，無與經典』之句意為：（元·朱宗文《蒙古字韻》、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等）這些書也只能增加一些見聞，但不能列入韻學經典。」個人以為，莫友芝以傳統語文學眼光篩選韻學著作，特別側重韻學著作是否具備「通讀經典」的實用功能，是以「與」應當解釋為「助」，因元·朱宗文《蒙古字韻》、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以外族文字標示漢音，對於通讀經典用處不大，故可略而不談。

反切改良、韻圖發展源流、韻圖體例的變化、等韻門法……等論題，均略而不談。

為何《韻學源流》明顯輕忽明清韻圖？個人以為，主要原因在於莫友芝以追求實用效能為首務，凡是無助於閱讀古籍、作詩用韻、拼讀切語者，均無意著墨太多。早期韻圖是拼讀反切的工具，其編製目的在於讓使用者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張麟之：《韻鏡·序》，頁1），順當地在韻圖字表上找到與切語相應的釋音字。《韻學源流》對《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尤為注重，因為此三圖不僅年代較早、影響深遠，且仍然保有拼讀中古切語的實用功能，故《韻學源流》云：「切韻之學，得二書輔司馬氏書，亦可識其大凡矣！」（頁27）明清以來，韻圖逐漸偏離原本的實用功能，不再單純只是用以拼讀反切的工具，更成為等韻家表達個人音學思想、建構理想音系的圖式²⁷，因為韻圖實用功能日益淡化，儘管韻圖數量急遽增加，且形制更加多種多樣，但對於切語之拼讀已無太大助益，故莫友芝選擇略而不談，或者一筆帶過。

為何篇中評述等韻卻只談論「字母」？蓋因辨析字母乃拼讀切語之根本，若不先弄清楚切語上字歸屬於哪個字母，勢必無法讀出正確字音，如李汝珍《李氏音鑑·凡例》所云：「前人釋論音義，類多分韻名篇，而罕有分母之書。故學者每遇切音，但知字隸某韻，而不喻應歸何母，於翻切之學，自難窮其根源。」（頁11）由此可知，《韻學源流》特別著重字母，也是著眼於拼讀反切之實際需求。

◆忽略外族文字的記音資料

反切之法取二個漢字拼讀一字之音，但反切有許多不完滿之處：一、漢字非拼音文字，無法清晰地展現音節內部結構；二、可供選用的切語數量繁多，造成識讀上的不便；三、以二字連讀成一個音節，拼讀過程中不免因贅餘音素橫阻其中，而造成拼讀的障礙。相較之下，以蒙古的八思巴字或西歐的羅馬字母標示漢字讀音，便顯得格外簡捷、精確。八思巴字、羅馬字母的記音資料，為建構近代漢語音系提供重要的依據，在當代音韻學史均有專節加以評述，但《韻學源流》以能否對經典閱讀有所助益作為評判價值的標準，對於這些外族的陌生文字，莫友芝認為「亦資

²⁷ 關於明清韻圖的設計理念與音學思想，請參閱王松木（2008），茲不贅述。

見聞，無與經典」(頁 28)，可存而不論。

總結以上所論，將《韻學源流》與當代音韻學史相對比，可以清楚看見在敘述形式上呈現出某些失衡之處——某些著墨太多、某些略而不論，此種敘述失衡的現象，正體現出《韻學源流》獨特的編纂風格，同時也隱含著莫友芝個人的音韻學史觀。

(三) 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

音韻學史著作不同科學性的客觀文本，在語料的篩選、剪裁、論述、辯證過程中，已悄然融入編史者個人的編纂理念，致使文本帶有文學的特質，體現出編史者獨特的個人風格。何九盈(2002: 89)認為好的學術史都是有個性的，並進一步指出塑造不同編纂風格的諸多可能原因：「學術個性的產生源於學術史研究者個性不同。如學術史觀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個人學術經歷不同，體驗不同，個人知識結構不同，個人寫作方式不同，個人興趣喜愛不同，個人的學術背景不同，凡此種種都會造成個性上的差異。」依照何九盈(2002)所言，可能影響學術史編纂風格的因素甚多，但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應是編纂者的史觀。史觀猶如歷史文本的靈魂，它決定編纂者如何篩選、剪裁史料，如何進行論述，以何種觀點進行辯證；縱使面對相同的史實，但只要編史者的史觀有別，自然就會呈現不同的編纂風格。

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為何？具體言之，歷代音韻學著作篇帙浩繁、品類眾多，有哪些韻學著作是有價值的、值得列入史冊並考究其發展源流的呢？根據上文對《韻學源流》文本內容與敘述形式的分析，可以獲知：莫友芝是站在傳統語文學(philology)立場觀看，將音韻學定位為一門實用的學問，認為音韻知識必須有助於閱讀經典、詩文用韻或拼讀反切，即如陳振寰(1988: 279)所云：「《源流》更多關注的不是研究漢語語音結構及語音演變規律的音韻學，而是從上古到清代圍繞作詩用韻所進行的有關韻類劃分、韻書編撰、韻字注音研究的源流發展。」這種觀點恪守「小學」的古老傳統，將音韻學視為讀書、應試、啟蒙的實用工具，與著重於分析音節結構、尋繹歷時音變規律之現代語言學(linguistics)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茲將兩者對比如下：

	傳統語文學	現代語言學
治學觀念	建構理想音系	描寫現實音系
研究目的	實用——通讀經典	科學——探究音變規律
研究路徑	偏向歷時	結合共時與歷時
研究材料	侷限於書面語	重視自然口語
研究方法	反切的對比、系聯	歷史比較法、內部擬測法
研究重點	求音類	求音值
標音符號	漢字（反切）	國際音標

《韻學源流》如何體現莫友芝的傳統語文學史觀？除了觀察《韻學源流》敘述形式的失衡現象之外（如上節所述），從以下兩項舉動也可略窺端倪：

1、改換名目，重新劃分研究範疇

如何劃分音韻研究範疇，體現出編史者對音韻學體系的認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三·韻書之屬》按語云：「韻書為小學之一類，而一類之中又自分三類，曰今韻，曰古韻，曰等韻也。本各自一家之學，至金而等韻合於今韻，至南宋而古韻亦合於今韻，至國朝而等韻又合於古韻，三類遂相牽而不能分。」（頁 908）清末勞乃宣（1843-1921）《等韻一得·序》則具體闡述音韻學的門類及其主要研究範圍，指出：

有古韻之學，探源六經，旁徵諸子，下及屈、宋，以考唐虞三代秦漢之音是也。有今韻之學，以沈、陸為宗，以《廣韻》、《集韻》為本，證以諸名家之詩與有韻之文，以考六朝唐宋以來之音是也。有等韻之學，辨字母之重輕清濁，別韻攝之開合正副，按等尋呼，據音定切，以考人聲自然之音是也。古韻、今韻以考據為主，等韻以審音為主，各有專家，不相謀也。（頁 1）

《韻學源流》刻意違反常例，別出心裁地將「等韻」改為「反切」，與「古韻」、「今韻」鼎足為三。當代學者對此一更動，評價不一，殷孟倫（1963：437）持反對意見，指出：「試問這樣改動是否更為合理？像他這樣的把音韻之道三分鼎立，反切自反切，而古韻自古韻，今韻自今韻，究竟能說明什麼？」陳振寰（1988：2）則抱持正面的看法，云：「等韻學本來就被前人認為是研究反切的學問，既然《源流》改《總目》對韻書的分類為對音韻研究路子的分類，那改等韻（猶如說『等韻學』）為等韻

研究的對象『反切』，而與古韻學研究的對象『古韻』、今韻學研究的對象『今韻』並立為三，不是很恰切的嗎？」

莫友芝為何特意以「反切」取代「等韻」？如此更動，究竟有何意義？個人以為，「等韻」、「反切」二者為體用之關係。「等韻」為「體」，以審音為主，旨在透過縱橫交錯的圖表來剖析音節的內部結構，從而設計出理想韻圖，以便讓使用者得以透過字表精準地找到與切語相應的釋音字，是以等韻之學往往具有強烈的理論色彩，非一般文人所能深究²⁸；相較之下，「反切」為「用」，即是強調在閱讀典籍上的實際運用，只求能辨明切語上下字所代表的聲韻類別，達到拼讀正確字音的目的即可，對於深奧的審音知識無需太過深究。由此看來，莫友芝刻意以「反切」取代「等韻」，明顯是將「實用」視為韻學研究的第一要務，至於明清等韻家所提出的各種糾繞贅亂之歧見，乃屬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可棄而不論。

2、強調音韻學的實用價值

莫友芝特別強調音韻學的實用功能，唯有那些對閱讀典籍、詩文用韻、拼讀反切有實際助益的音韻學論著，才是莫友芝認為有價值而想要進一步溯源、評述的對象。因此，對於學術價值判定，亦以能否展現實用效益為依歸，如：在古韻部分，莫友芝強調古韻學有助於理解《詩經》的用韻及破除假借字，云：「夫古音非僅為《詩》也，經典多同音相借，訓詁多聲近相受，能明之者，其于故言假字亦豈小補哉！」（頁 9-10）在今韻部分，莫友芝則只專注於歷代詩家承用之韻譜，甚至將《韻海鏡源》這類「以韻隸事」的類書也一併納入其中，只因這類韻書蒐羅韻藻，對於文人作詩用韻有所幫助，至於《中原音韻》之類的北音韻書，因既無益於經典閱讀，又與寫詩用韻無太相關，如此便可略而不論。在反切部分，則只顧及到是否有助於拼讀反切，基於「反切生於雙聲，雙聲生於字母」（頁 28）的想法，對於明清等韻只聚焦在字母分類上，無意深入窮究諸家異說；至於外來語文（八思巴文、羅馬字母）

²⁸ 等韻之理深奧難學，非一般文人所能專精。呂坤（1536-1618）《交泰韻·序》論及幼時學習等韻的經驗，云：「余少從里兒遊，讀半邊字，長而恥之，積韻家書，無慮數十，浩浩茫茫，未之所入也。萬曆甲戌（1574），得同年雷侍御慕菴而問之，侍御日談，余瞢瞢聽，竟不了了。侍御曰：『此等子音也，須熟讀括歌月餘，舌與俱化，自可得聲。』余畏難而止。」（頁 1）

雖然在語音拼讀上有其便利性，但因對經典閱讀沒有實質幫助，可存而不論。《韻學源流》結語云：

即字母一端，而諸家如此紛紜，其他之糾繞贅亂，亦不可究詰，聽其自生息，亦難與是非矣。至(元)朱宗文《蒙古字韻》(二合)三合、四合之音、(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二十十字母、五十字母之說，亦資聞見，無與經典。學者但精求之雙聲疊韻，于徐言、疾言中通其意，理明事簡，勿為煩紆；以求古人之正讀，審今韻之變遷，則古韻、今韻、反切，一以貫之矣。(頁 28)

總結以上所論，《韻學源流》持傳統語文學史觀，特別注重音韻學論著之實用價值；今日音韻學家則是以「現代語言學」史觀來建構音韻學史，格外看重音韻論著能否反映實際語言的演變過程，強調音韻論著之科學價值。兩種不同的音韻學史觀，各有其觀看的角度與評判的標準，必須在兩者之間建構起能夠共同對話的平臺，方能避免雞同鴨講，陷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窘境。

四、如何合理解釋、評價《韻學源流》

編史者並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為作」，故在史實的描述與解釋上，往往也摻雜著個人的主觀意念，呈現出個人獨特的編纂風格，隱含著個人奉持的音韻學史觀。當我們評鑑前人的音韻學史著作時，如何克服時空背景與意識形態的隔閡，盡可能免除以今律古、強人就我的弊病，從而給予合理的解釋與評價呢？這些都是我們在評論《韻學源流》時，所應當深入思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應歸屬於「音韻學編史學」(Historiography of phonology)的研究範疇。²⁹

²⁹ 依照研究對象與目的的差異，音韻研究的學科體系可以有不同分階：第一階「音韻學」，以現實存在的語音為對象，分析語音的內部結構，並探究語音的歷時演變規律；第二階「音韻學史」，以音韻學著作(或音韻學家)為主要對象，探究音韻學的研究成果及學術發展趨向；第三階「音韻學編史學」，則是以音韻學史(或音韻學史家)為研究對象而進行「元史學」研究，分析編史者的史觀，並思考如何合理解讀、評價音韻學史。不同分階之間雖各自分立，但卻也緊密關聯。本文以《韻學源流》為研究對象，旨在觀察羅常培(1929)、殷孟倫(1963)、陳振寰(1988)等學者如何理解、

今人詮釋歷史文本，不宜過度誇大今日與過去的相似之處，而應當盡可能地回溯到過往的歷史語境之中，站在古人的立場思考問題，細心辨識古今相異之處。然而，當代學者大多只從「語音史」的觀點評論《韻學源流》，就如同只睜開一隻眼睛看世界，不僅無法盡窺文本之全貌，而且經常產生以下幾個盲點：一、偏向輝格式的歷史詮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³⁰，即以今日的觀點或標準評判過往的音韻學史，忽略歷史語境的差異，而不自覺地產生以今律古的毛病；二、傾向從學科內部尋求解釋，忽略外部因素對音韻學史的建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三、評論者多將目光側重在「史學」、「史才」層面上，忽略了發掘「史識」層面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單一視角——當代語音史的觀點

羅常培（1929）以 20 世紀現代音韻學的眼光審度，批判《韻學源流》的缺漏與疏失，並勾勒理想漢語音韻史所應包括的內容，云：

惟全書取材多本《四庫提要》，故論「古韻」只斷至顧、江，而不及戴、段、孔、王諸家；論「今韻」則以《洪武正韻》與《韻府群玉》並詆，而不重視《中原音韻》以後之音變；論「反切」則但詳《指掌圖》《指南》《四聲等子》三書，而於前此之《韻鏡》、《七音略》，後此之《韻法橫、直圖》、《字母切韻要法》，及明清等韻別派，亦並略而弗陳，凡茲罅漏，均待補苴，猶未可視為完備之聲韻學史也。然古今聲韻，疑滯孔多，倘欲考鏡源流，究其通變，舉凡周漢古韻之音讀，隋唐韻書之反切，元明語音之蛻化，旁及華梵譯語，東西音標，下至殊域方言，民間歌謠，畢須博采旁求，探蹟索隱。（頁 29-30）

羅常培（1929）從學科內部解釋音韻學史的發展，注重語音史與音韻學史的關連性，預先假定音韻學史必須揭示語音分析的觀念隨著時代而不斷進步，且能為語音史的

評價《韻學源流》，此種研究應歸入第三階「音韻學編史學」的範疇。

³⁰ 英國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Butterfield）《歷史的輝格解釋》（1931：12）：「輝格黨式的歷史解釋關鍵在於，結合現在研究過去；……這樣做常常阻礙了對歷史的理解，因為它把歷史的認識理解成直接地、永遠地參照現在來研究過去。通過這種直接參照現在的體系，歷史人物會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分成促使時代進步的人以及試圖阻礙時代進步的人。這樣，就產生了便捷的經驗法則，歷史學家依照它可以任意挑選和淘汰，從而突出他的重點。」

建構提供可用材料，因而認定理想的音韻學史應當旁及華梵譯語、殊域方言。然而，「建構歷史音系、探究音變規律」這是高本漢以後的音韻學所強調的使命，不能將此任務強加在莫友芝身上，羅常培（1929）藉由批判《韻學源流》強調當代音韻學的觀點，未能賦予客觀合理的評價。

陳振寰（1988：6-7）雖然肯定《韻學源流》在普及音韻學知識上的價值，但也對其中不合乎理性精神的論述提出尖銳的批評：

《源流》論古韻，以《詩經》用韻為中心；論今韻，以「歷代詩家承用之譜」為中心；論等韻，以反切、三十六字母為中心。它立足於聲韻之用於詩文，對韻學理論、聲韻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規律不重視、不理解，對反映實際語音因而偏離傳統韻書的著作、觀點採取漠視、排斥態度，這就使它自覺地框限了視野，以致不可能成為全面的、完善的、更為科學的音韻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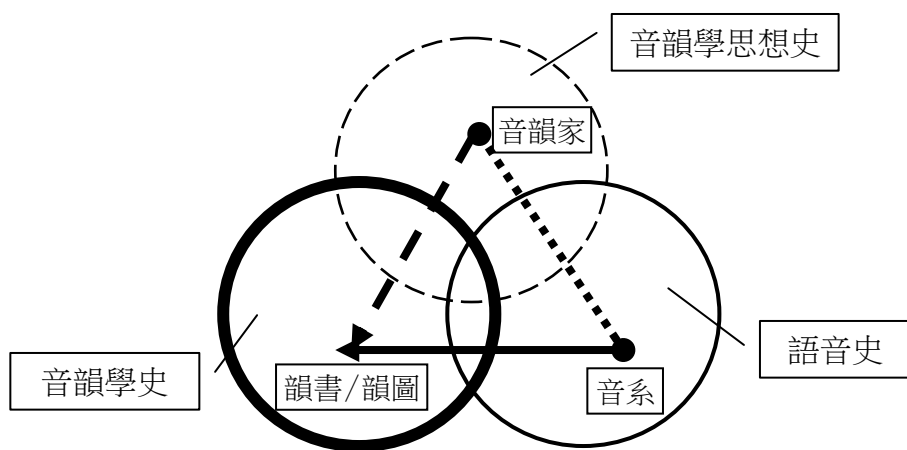
莫友芝只能就當時體認編纂音韻學史，不可能預先知道百年之後學者們理想音韻學史是何種模樣。羅常培（1929）、陳振寰（1988）均是站在今人的立場解釋、評價《韻學源流》，抹平了時代背景與學術思想的差異，同時忽略了個人主觀意圖可能造成的影響，此種輝格式的歷史詮釋，將難以對《韻學源流》做出合理的解釋與評價。如何避免因側重「移時」（anachronical）解讀³¹而造成理解上的誤差呢？個人以為，當如赫爾奇·克拉夫（Helge Kragh）《科學史學導論》所言：「如果分析某一文本發現了愚蠢之處、明顯的荒謬或者不一致，就不應當立即把它作為真實歷史特徵的表達來接受。相反，應當起疑心，懷疑自己是否已經恰當地理解了該文本。這些荒謬和不一致性很可能是移時解讀的結果，在恰當的歷時視野中它們很可能就不存在。」（頁 106）

（二）多元眼光——融入「音韻學思想史」觀點

³¹ 〔丹〕赫爾奇·克拉夫（Helge Kragh）（2005）將理解科學史的角度分成「移時」（anachronical）、「歷時」（diachronical）二類。「移時」觀點就是根據我們今天擁有的知識來研究過去的科學，以理解其發展，尤其是它怎樣導致今天的現況；「歷時」觀點則是希望能按照過去實際存在的境遇和觀點來研究過去的歷史。史學家在實踐過中，並非從二者之中挑選其一，通常這兩種不同觀點是同時並存的，它們相對的權重取決於所探索的特定主題和探索的目的。（頁 96-97）

從不同角度凝視物體，並將不同信息加以統合，方能感受到深度感；同樣道理，今人解讀《韻學源流》，也必須同時兼具「移時」、「歷時」兩種不同視角。然則，為何當代音韻學者大多只以「移時」觀點來理解歷史文本呢？個人以為，這與 20 世紀漢語音韻學的典範轉移有關。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引進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迅速取代顧炎武的古音之學，成為主導 20 世紀音韻學發展的新典範。當代音韻學者皈依在高本漢典範之下，逐漸脫離人文領域而向自然科學看齊，以重構古代音系、探究音變規律為目標，因而特別關注「音韻學史」與「語音史」之間的連結關係（如下圖所示）。³²

高本漢典範為漢語音韻學研究掀起革命，無論是研究目標、理論、方法或材料上，均與傳統語文學不同。此一突來的劇烈轉變，使得傳統與現代之間產生斷裂，雖然新的典範為漢語音韻學注入活力，但卻因過度強調客觀、理性與科學化，而不自覺地加深了「科學」與「人文」間的鴻溝，截斷「音韻學史」與「音韻學思想史」之間原本相連的紐帶。



錢軍（2003：549）論述語言學史學的研究方向，指出：「語言學史學應該聚焦於以文本為基礎、以其他材料為輔助的語言學思想史的研究，關注於語言學家在文本當中說了什麼，怎麼說的，為什麼這麼說。」同理，「音韻學史」的編纂風格既取

³² 關於「語音史」、「音韻學史」、「音韻思想史」三者之間的聯繫與區別，請詳見王松木（2012：86）的說明。

決於史家的史學、史才與史德，研究「音韻學史」又豈能將編史者個人的思想排除在外？研究者必須同時觀察《韻學源流》的文本內容、編纂風格與音韻學史觀，並統合「語音史→音韻學史」、「音韻學思想史→音韻學史」兩條路徑所得到的相關信息，方能兼顧移時與歷時的觀點，從而對《韻學源流》有真切的理解與合理的評價。

五、結語——思考「音韻學編史學」的意義與價值

音韻學史的編纂具有個人風格與時代意義。正因如此，音韻學史勢必得隨著時代環境、學術價值的變易而重新改寫³³，方能迎合教學與研究上的實際需要。對於清代中晚期的讀書人而言，《韻學源流》或許展現「理明事簡，弗尚煩紆」的優點，具有普及音韻學知識的效用。然而，時過境遷，對今日之音韻學的學習者而言，《韻學源流》已無法滿足現代學術研究的需要，那麼此書是否還有研讀的價值呢？如何賦予《韻學源流》新的時代意義呢？殷孟倫（1963）雖曾思考過這問題，但卻未能提出具體的看法。

試問：研究音韻學史有何意義與價值呢？³⁴個人以為，「音韻學史」必須與「語音史」、「音韻學思想史」相結合，在彼此跨越、相互整合的過程中，在漢語音韻學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架起橋樑，為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和對話提供便利的平臺。因此，藉由《韻學源流》的研究，本文嘗試著將音韻學與其他人文學科相互連結：首先，考察莫友芝的學術淵源與生平志趣，了解《韻學源流》的編纂動機與目的，將「音韻學史」與「思想史」、「區域文化史」相連結；其次，觀察《韻學源流》敘述形式上的失衡現象，掌握莫友芝的編纂風格與音韻學史觀，將「音韻學史」與「元史學」、「功能文體學」相連結；最後，探索如何理解與評價《韻學源流》，則是將「音韻學

³³ 學術史必須與時俱進，何九盈（2002）指出改寫學術史的幾項原因：1.其始作也簡；2.學術背景的改变；3.新材料的發現，新問題的提出；4.學術價值觀念的改变；5.語體的改變。

³⁴ 科學史研究者也將常反思自身的研究價值。〔丹〕赫爾奇·克拉夫《科學史學導論》第三章、劉兵《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第三章，均對科學史的研究價值有深入討論，請自行參閱。

史」與「科學哲學」相連結。如此看來，「音韻學史」的研究絕非封閉孤立、只能孤芳自賞，而是可以廣泛連結到其他學科。20 世紀以來，漢語音韻學不斷走向科學化，卻也逐漸與人文學科漸行漸遠，「音韻學編史學」或許可以矯正研究路徑的偏差，對於漢語音韻學的多元發展，特別具有時代意義。

儘管漢語音韻學的歷史十分悠久，但因長久以來音韻學被視為解經的實用工具，附庸於經學之下，像《韻學源流》這樣能全面總結以往音韻學研究成果的學術史論著並不多見，正因如此，「漢語音韻學編史學」至今仍是一片無人探索的空白領域。希望透過本文拋磚引玉，能激起更多人關注這塊空白的領域，共同思考相關的問題。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隋·陸法言：《切韻·序》，《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出版社，2001。
- 宋·張麟之：《韻鏡·序》，《等韻五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 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濟南：齊魯書社，1992。
- 明·呂坤：《交泰韻》，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2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南京圖書館藏明末胡正言十竹齋刻本。
- 清·江有誥：《音學十書·詩經韻讀》，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同治戊辰年重修木樨山房藏版。
-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第9冊，收入《萬有文庫薈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清·莫與儔、莫友芝：《莫氏四種》，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1輯第403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清·莫與儔：《貞定先生遺集》，收入清·莫與儔、莫友芝：《莫氏四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清·莫友芝著，羅常培校點：《韻學源流》，廣州：天成印務局，1929。
- 清·莫友芝著，張劍等編輯校點：《莫友芝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 清·張裕釗：〈徵君莫子偲墓誌銘〉，收入清·莫與儔、莫友芝：《莫氏四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頁477-482。
-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光緒戊戌年刻本。
- 清·鄭珍：《巢經巢集》，收入《四部備要》集部第132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 清·黎庶昌：《拙尊園叢稿》，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清·謝啟昆：《小學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二、近人論著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25 / 1998。

* 王松木：《擬音之外——明清韻圖之設計理念與音學思想》，高雄：高雄復文出版社，2008。

* 王松木：〈論音韻思想史及其必要性——從魯國堯問題談起〉，收入《聲韻論叢》第17輯，臺北：學生書局，2012，頁77-132。

史繼忠：〈「沙灘文化」揭秘：文化與教育交融〉，《教育文化論壇》2（2010），頁99-102。

* 白雪華、湛廬：〈《韻學源流》作者考實〉，《文獻》3（2007），頁185-187。

石尚彬：〈晚清著名教育家莫與儔〉，《貴州文史叢刊》5（1997），頁66-69。

* 何九盈：〈中國語言學史研究芻議〉，《語言科學》1（2002），頁86-91。

呂友仁：〈乾嘉樸學傳黔省 西南大師第一人——鄭珍學術成就表微〉，《河南師大學報》2（1997），頁57-61。

吳鵬、簡小婭：〈《影山草堂圖》：莫友芝父子的鄉愁與風雅〉，《中國書畫》8（2012），頁72-76。

* 周斌武：《漢語音韻學史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武誼嘉：〈楊慎對西南區域文化的貢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4（2009），頁70-72。

* 姚小平：〈語言學史學基本概念闡釋〉，《外語教學與研究》3（1996），頁8-14。

殷孟倫：〈莫友芝與《韻學源流》的關係質疑〉，《子雲鄉人類稿》，濟南：齊魯書社，1963 / 1985，頁422-441。

袁江洋：〈科學史編史思想的發展線索——兼論科學編史學學術結構〉，《自然辯證法研究》12（1997），頁34-41。

*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8 / 1986。

張其昀：《新方志學舉隅——遵義新志》，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

- 梁光華：〈莫友芝與曾國藩交往述論〉，《貴州大學學報》4（2011），頁 121-125。
- 陳振寰：《韻學源流注評》，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30 / 1992，頁 507-509。
- 黃萬機：《莫友芝評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 黃萬機：〈夜郎故地文化史上的奇葩——遵義沙灘文化述論〉，《教育文化論壇》2（2010），頁 103-109，125。
- 劉兵：《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
- 黎鐸：〈「沙灘文化」概念的思考〉，《教育文化論壇》2（2010），頁 110-114。
- * 錢軍：〈語言學史學：問題與思考——以語言學史學對雅科布森與索緒爾關係的研究為例〉，《語言學——中國與世界同步》，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頁 538-555。
- 韓震、董立河：《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羅常培：〈校印莫友芝《韻學源流》跋〉，收入清·莫友芝著，羅常培校點：《韻學源流》，廣州：天成印務局，1929，頁 29-30。
- 饒文宜、梁光華：〈莫友芝《韻學源流》重校舉要〉，《古籍整理研究學刊》5（2009），頁 30-31。
- * 〔丹〕赫爾奇·克拉夫著，任定成譯：《科學史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英〕巴特菲爾德著，李晉譯：《輝格黨式的歷史解釋》，北京：三聯書店，1931 / 2013。
- * 〔美〕海登·懷特著，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199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i Xue-hua and Zhan Lu. “*Yunxue yuanliu zuozhe kaoshi*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or of *Yunxue Yanliu*]”, *Wenxian* 3 (2007):185-187.
- He Jiu-ying.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Linguistic Science* 1 (2002): 86-91.
- Kragh, Helge. Ren Ding-cheng, trans.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Qian, Jun,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Linguistics: China and the World synchronization*, ed., Qian Jun, pp. 538-555.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 Wang Song-mu. “On the History of Phonology Thought and its Necessity: A Discussion from ‘Guo-Yao Lu’s Question.’” In *Chinese Phonology*, vol.17, pp. 77-132. Taipei: Student Books, 2012.
- Wang Song-mu. *Niyin Zhiwai—Mingqing yuntu zhi sheji linian yu yinxue sixiang* [In addition to Mimic Sound – Designed and Phonetic Concep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aohsiung: Kaohsiung Fu-wen Publishing House, 2009.
- White, Hayden. Chen-Xin, trans.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Nanjing: Yi-Lin Press, 1997.
- Yao Xiao-ping. “Explaining concepts in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 (1996): 8-14.
- Zhang Shi-lu.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Zhou Bin-wu.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87.

